

之视为“文化”之族群范畴而淡化之，以强化一体之国族与国民认同¹。看来，面对如何将边疆之地与人纳于中国之民族国家政治结构与秩序内此一重大问题，当年中国政学界精英们共同践行的是一条便捷的道路，也就是造“民族”，以此构建多元一体之中国。而造“国民”的工作，和以每一国民为单元的多元一体中国理想，虽然由国民政府时期到1949以后一直进行着，无疑这是一条艰辛、漫长、曲折但仍必行的道路²。

【论 文】

中国社会研究史中的西南边疆调查：1928-1947³

田 耕⁴

内容提要：1928-1947年的西南边疆调查，是中国社会研究史上激活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边疆调查的关键时期。三个学科的实地研究形成了对此后影响深远的新传统。本文结合边疆研究的生平史和对研究作品的概念考察，表明1934年中研院的机构调整促成了社会科学所和史语所各自的关键转向，使其分别形成了结合经济史与民族史的田野工作理念。其中深蕴的历史想象，与南迁的燕京大学社会学在边疆继续“民族志社会学”的“自然史”理念有着深刻的区别。

关键词：边疆调查；西南民族；民族志社会学；自然史

1947年4月19日，结束抗战的中国在成都蜀中饭店迎来了边政学者和蒙藏委员会官员举行的“边疆自治与文化”会议⁵。从事边疆调查的学者在这个会议上根据战时的研究经历讨论了如何重建边疆的问题。这一会议，更像是这些经历了艰苦的边疆调查的学者据此对边疆之未来的交流。与会学者从事研究的边疆地点并不相同，但无不在战前和战时的边疆调查中完成了各自关键的学术转型，成为20世纪上半叶边疆民族调查的中坚力量。就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旧一新的两部边疆民族考察报告：凌纯声和芮逸夫1940年写就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和林耀华的《凉山夷家》。两部同年出版的著作所依据的调查却隔了十年之久。《湘西苗族考察报告》是凌、芮两人1933年在湖南进行苗族调查的民族志，而《凉山夷家》总结的是已随燕京大学从成都返回北平的林耀华1943年进入四川、西康和云南交界的大小凉山所做的田野观察。

¹ 相关讨论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122-133；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前者之文倡议建立“国民”意识与认同，后者之文强调“个人的公民权利平等”，两篇文章都指出近代中国国族建构中强化“民族”认同，而未注重边疆人群的“国民”身份认同。对此之反对意见亦不少；其中之一见，郝时远，《中华民族建构问题的几点思考》《中国民族报》2012年4月13日。

² 从某种角度来说，造就有认知与反思能力（而非仅具形式民主如投票能力）的国家公民，在全球国家中都相当艰难，而经常受到各种诉诸根基情感的群体认同干扰。特别是在网络传媒普遍流行的时代，各种“部落主义”（tribalism）——宗教部落主义、民族部落主义、职业或阶级群体部落主义——皆藉网络来凝聚与动员其群体。这样的发展倾向，特别是各种网络群众带领者煽动的民粹主义（populism）盛行，近年来已明显地逐渐侵蚀“公民社会”所赖的个人理性认知、判断与反思能力。

³ 本文刊发于《学海》2019年第2期，第22-33页。

⁴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⁵ 出席会议者包括凌纯声、芮逸夫、柯象峰、马长寿、许公武、卫惠林、马学良、梁晓第、周昆田、张承焯。凌纯声、芮逸夫和马长寿等人的发言刊登在《边政公论》第六卷（1947年）第二期。



成都会议和两部边疆民族调查著作的出版，距离和凌纯声同年、长林耀华八岁的杨成志孤身进入凉山正好 20 年。在以中国西南的凉山开启和结尾的 20 年中，边疆调查逐步变成中国学术史上独立的研究类型。要继续讨论上述 20 年间作为学术类型的边疆民族调查，边疆危机的加深和学术传统的转化是两个最基本的学术史情境。首先，因为 20 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边疆田野工作多是在 1930 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加深之后进行的，研究者们会时时遭遇到在内地与边疆之间激荡的关于国家、国族与民族的争辩（马戎，2016；温春来，2018: 31-264）。边疆危机引发的论证也变成了国家与国族观念演变的契机。深入的田野工作使得这一学术类型的建设者在族与国的观念上区别于没有此经历的上一代学人。而这段学术史很自然地变成了重新理解和书写民族与国家的历史。

第二个基本的视角是将这 20 年的时间视为西南边疆民族调查运动（survey movement）开展的历史，因此将西南视为学术传统转换的场域。在此转型发生之前，传教士融民族学、民俗和语言观察为一体的田野调查不仅极大地启发了早期汉学，也在 20 世纪初达到了为现代中国学者认同的高峰（黄文山 [1936] 2013: 29；徐益棠，1946；王建民，1977: 61-73；王利平，2016: 120）¹。因此，本文从西南边疆民族调查的历史中选取的 20 年，首先是大量接受西学和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中国学者以不同的方式密切进入中国田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学者除了需要在田野中思考训练自己的域外传统，还需要面对数量非凡的传教士调查记录和早期汉学写就的地理、历史和人群之风俗²。

随着抗战开始以及大量的学术机构向内地迁移，作为整个抗战后方的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与传统的边地有所区别。向边疆去和建设后方的情势同学们在迁徙之后的学术转向重合，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 1940 年代展开的边政学问题。众多以边疆研究为学术专长，或关注边疆的知识人投入到这个学术名目的界定与争论当中。相当一批的学者也在政府中担当起了边疆政策的设计角色（王建民，1997: 265-275）。这种转向边政学的现象为我们提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从彼此不同的研究传统进入到不同的边疆，对边政学赋予的意义和内涵有何不同？以边政学为一个思考框架，反过来对边疆或者说边疆研究的想象力有何改变？

近年来，学者们对“边政学”的历史进行了有效的讨论和材料积累（杨天宏，2010；汪洪亮，2014）。但在边政学成为中国学者所自觉采用的说法之前，这一领域的学者有着非常不一样的边疆民族研究经历。从学术史上看，这些边疆民族调查各有其产生的思想与学科资源，而且其在此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继受和影响也有很大的差别。仅存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边政学”之名，固然可以在历史语境下标识这些边疆调查和研究，但仍不足以揭示出这些调查研究作为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型在学术流变上的内涵。如何以学术史的眼光和方法来揭示边政学转向背后的中国学术生态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一些重要方面，在中国社会学史蓬勃的今天仍然是一项值得努力的尝试。本文试图从西南边疆调查和研究，特别是川滇地区在 1928-1947 年之间的变化，来进行学术史的尝试。

上述两个基本的情境中包含了两组学术史探究需要重视的关系：一则是边疆田野工作与族群及与国家观念之书写的关系，二则是边疆田野工作与学术范式转移的关系。在最直接的边疆民族

¹ 直到 1930 年代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学者仍将传教士的实地调查研究视为田野工作的基础，在对边疆民族进行族源考证的工作中，传教士的语言学考察更是被学者们和古代方志中的族名记载视为同类型的材料，例如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es）在云南考察时对云南非汉语人群的语言学分类，这种分类对此后重要的中国学者——如凌纯声、陶云逵和马长寿等民族学家以及李方桂和罗常培等语言学家——考察西南非汉语人群的语言学分类的影响，特别是“苗瑶”与“民家”的问题，见彭文斌（2007: 8）。

² 黄文山（[1936]2013: 237）很清楚地看到，传教士在明清之后的调查记录，直接影响的是如斯宾塞这样的普遍文明论者。如果按照黄文山的观察角度，如果经历了西学和现代社会科学体制的中国学者对上述传教士调查的对象重新观察和写作，是否能提供不一样的普遍文明论？我们是将这些作为田野工作之前不得已而存在的人文想象作为学术前史代替之，还是作为文明论的先驱对待之。



志与国家的关系中,发现和再发现边疆的人民和空间,不仅是国家之间竞争的产物(Febvre, 1973; Craig, 1984),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家力量在边地的形成和扩展(Sahlins, 1989)。这种相互刺激的一个后果是瓦解了“自然边疆”背后预设的国界和族界的合一¹。以巴特(Fredrik Barth)为代表,关注族群的社会学家瓦解了将自然边界(地理和生态)作为“族界”的含义,由此对族群身份进行了新的理解(Brubaker, 1996; Adelman and Aron, 1999)。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费弗尔的影响,将边疆视为临近之族群、宗教、语言和生态竞争的结果(Barth, 1969; Cole and Wolf, 1999)。

如果从地缘政治中的国与国转到文明想象中的国家关系,那么对地理上的边疆的认识,也会折射出对文化中的他者的想象。例如,对罗马边疆的想象,构成了欧洲民族国家认识自身传统的一部分(Whittaker, 2000)。观察学术类型的内在视角就从这种想象边界之外的他者开始。不同的国族想象竞争的场域之一,就是对文明的他者的语言、人种和风俗的知识考察的竞争。这种考察产生于对边缘的田野和语文考察,也对边疆和族群的田野观察有最深的影响。对19世纪后几乎影响全世界族群分类的印欧语言学,来自人类学和西方中古史背景的学者致力于理解其中的德国浪漫派思想背景,以及法国思想对这一观念的批判(Bloch, 1990; Dumont, 1994: 57-65; 埃利亚斯, 1998: 第1章; Geary, 2002)。

上述两个视角构成了学术史上考察和田野工作相关的边疆民族研究的基本入手点。然而,整合内外视角要服务的根本问题则是,我们如何通过学术史的勾陈重建研究类型。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不断重返学术史的原因,是要获得对实质的概念与似乎熟稔的经验的新鲜感受,以及持续研究的动力,而不是囿于对学派和学人的定见,或是寻找“遗珠”的好古之学(antiquarianism)。因此,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学术史写作的方式——来整合上述两个基本的视角就非常关键。

从考察对象上来说,学术史的对象一定是在具体历史开展中形成的知识,但对这一时间性的对象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学术史写作的对象具有内在紧张。一方面,学术史的确非常接近以知识为对象的历史社会学考察,无论是从学术的从业人口入手,或者是从学科或机构的组织沿革入手,学术史的考察对象都是在特定时空中学术道路被走出来的轨迹。这种在高度有序的时间性的勾陈中恢复的是学术的日常生命,当然也包括在田野工作中最基础也最微观的行动。但极为日常或者微观的生命史并不意味着不可预见。就此而论,无论是聚焦在人,还是聚焦在物(学刊、系科、学社等等),对传记性的材料(biographic materials)的使用就非常关键(Lindner, 1996: 31-114; Abbott, 1999)。

但另一方面,学科史的对象又可以是非常具有时空错置性(anachronism)的理想和观念力量。这种学术理想固然和学术人物的主张大有关系,但也未见得是明确标榜的理念。它可以与同时代人互通声气,但也非常可能是从跨越时代的理念中找到灵感。我们如何对待一个时代的“预流”和“逆流”,如何对待面临大量外来观念和传统冲击下的反省,非常需要解放学术史在时空错置的观念交织中的想象力,也就是要将学术史写作中的“情景化”(contextualization)作更为复杂的架构,在学术实践的有序进程和概念的时空错置之间搭建有效的分析,使得学术史的转折,分期和类型化具备新意。在这个意义上,借鉴思想史的概念考辨来对学术文本加以理解和比较,是扭转学术史和学科史走向机械的情境决定论的一个关键(Ringer, 1969; Aarsleff, 1982; Pagden, 1982: 119-200; Olender, 1992; Lindner, 1996: 115-153)。

在以上的思考线索中,本文试图结合两个分析角度来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西南边疆民族调查何以构成学术类型。一方面需要对研究作品的文本进行比较。另一方面需要从研究开展的具体情境,特别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的生平史中看到学术演变的动力。蔡元培论民族学的文字,构

¹ 从法国学界对费弗尔堪称经典的“自然疆界”研究《莱茵河》(Le Rhin: Problemes d'histoire et d'economie)的批评开始,萨林斯(Sahlins, 1990)详细讨论了十七世纪当中致力于建设“自然边疆”的政治理论是如何展开的。



成了观察这一学术类型的着眼点。

一、

蔡元培振作民族学的想法，可以在他 1926 年冬发表在上海《一般》杂志上的《说民族学》（[1926] 1962）一文中看出来。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的重点是将民族学和人类学加以区别。民族学以共享文化生活之民族（Folk）为对象，因此可以说是对各民族文化的比较之学，而人类学则是以人的生物构成（体质）为前提的研究¹。1930 年蔡元培在中国社会学社上致辞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则将民族学和社会学视为文化-社会比较的“原初”与“发达”两端。但这两端都是置于当前历史，而不是考古式的研究。事实上，在清末至蔡先生发表两文之前的十余年当中，从丁文江 1914 年在四川和云南进行的体质测量开始，到李济归国后的人类学尝试，及至蔡元培推荐出书的俄国学者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由体质测量进而辨析人种都是最主要的民族学形式（王建民，1997：85-89）。尽管蔡元培两文秉持的民族学概念极受 19 世纪德语学界的民族学或东方学的影响，但它们提出了将民族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加以区分的第一个说法，其将民族（folk）与人种（race）加以区分的做法与此前中国学者（例如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1903）将民族学与人种志混用的做法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这三个学科正是在战时中国非常关键地塑造了边疆调查实质的学术脉络。

蔡元培的学科区分，在他直接推动成立和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的学术门类里面更是看得清楚。1927 年，蔡元培兼任筹备中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的民族学组长²。次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将研究西南的苗、瑶族放在最初的计划之列³。德国学者颜复礼（Fritz Jaeger）和在北大从莱辛学者欧内克（Waldemar Oehlke），担任史语所特约编辑的商承祖（章孙）即在这一年前往广西凌云县调查瑶族的生活和文化状况。7 月到 8 月，两人在凌云县的北部调查了 6 个瑶族聚居的村庄。在蔡先生的支持下，这次调查后写就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成为“中研院社会科学所专刊”的第二号在 1929 年出版。对这个报告兴趣最大的是刚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萨丕尔（Edward Sapier）拿到博士学位的李方桂。1929 年入职史语所后便着手西南的壮-侗语言研究的李方桂随后写了《广西凌云瑶语》一文（李方桂，1930），试图证明瑶语更近苗语，而不是如颜、商二人认为的那样近泰语。

就在颜、商二人在广西山中开展调查的时候，影响早期中国边疆社会研究甚巨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在 1928 年 7 月成立于广州。人类学与民物学组是该所初设的八个组别之

¹ “比较”在 1936 年凌纯声的解释当中更是民族学与民族志区分的关键，而凌纯声也完全赞同人类学的体质含义，将美国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等于欧洲大陆的 Anthropologie，参见凌纯声[1936]2003:2-3。陶云逵的民族与人种之区分（[1936]2011:115-116），也与此意相同。而马长寿在《人类学在我国边政上的应用》一文（[1947]2003：2-3）中很敏锐地指出，人类学被视为初民之学，而和研究文明化国家之组织之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区分开，很受凡尔赛体系后将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的影响。但马长寿因此认为将“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变为“俗民社会”（folkway society）可以说是西方人类学内部针对上述不当的文明划分的一个回应（类似观点参见）。但对初民 vs 文明化的区分的真正质疑，不是针对进化论的批判，而是两种普遍历史之间的紧张，即按照人种-语言志将人类普遍划分的“自然历史”和按照宗教与政治划分“文明传统”这两种历史观念之间的紧张。自然史的现代版本，强烈质疑了文明传统建立起来的整合力与制度价值，参见 Momigliano，而不是即不是自认为历史顶端列强和无法进入普遍历史的“初民”之间的紧张。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学术史的内部，还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内部，都有很多再讨论的空间。

² 根据 1927 年 7 月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时为大学院的附属单位的中央研究院准备下设社会科学研究所，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天文台。社会科学研究所实际成立于 1928 年 3 月，杨端六成为首任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社会，法制，经济四组。这一个结构持续到 1932 年 5 月因为经费问题而取消，参见《中研院二十一年年度报告》，第 321 页。

³ 参见《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



一，而史禄国被聘至该组主持研究。同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则在半年前就成立了和史语所名称相仿、学术旨趣接近的语言与历史研究所（语史所、杨成志，1931）。两所机构对边疆研究的共同期待在1928年的夏天迈出了第一步：史禄国夫妇和两位年轻的广东学者容肇祖与杨成志一起离开广州向西。他们准备取道河内，前往云南进行边疆调查（杨成志 [1930a] 2003）。此时，距离史禄国第一次到北京从事研究已经超过了10年，他关于通古斯的研究也在四年前出版¹。在和西伯利亚与中国的东北迥异的西南，史禄国一方面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另一方面也准备完成地方文献的搜集。如果两方面的计划实现，史语所和中山大学共同期待的边疆调查也许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在昆明停留了月余之后，容肇祖带着他搜集的地方文书材料返回广州，此后写作了未曾公开发表的《云南种族及民俗调查报告书》（王传，2015：13）。史禄国夫妇则在昆明完成了体质测量后，找到了居住在昆明的一家四口的傩傩族人，对这家人进行了语言学，特别是发音的观察和记录（Shirokogoroff, 1930：183）。史禄国没有再继续前往计划中的云南东南部，而是返回了广州。他在昆明的语言学观察后来发表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一卷第二分本上，名为《记猓音》（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

这一行中最年轻也最固执是杨成志，他9月独自从昆明继续向北，10月抵达了凉山²。此后的2个月里面，他结识了彝民首领，在上百个彝族村落里面开展了他第一次长时间的西南边疆调查。在《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于1929年初出版的时候，杨成志则在凉山下的巧家县开始学习彝文。流过四川、西康和云南的金沙江西岸开始慢慢变成了他脑中清晰一点的民族志田野。1929年5月，他在对西南民族的方志又做了一番考察之后，决定在未来四年内对云南全省进行深入的调查。可惜，他最终没有得到想要的入滇经费，1930年3月经河内、香港返回广州。

在杨成志1年8个月的田野跋涉中，早期边疆调查的局面发生了从南到北的变化。史禄国中途返回广州后，结束了在中山大学的合作而专事史语所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工作。1929年5月迁往北平的史语所将原来的8组减为3组，人类学和民族学被放在了李济领衔的考古组之下。傅斯年并不希望这部分工作就此停止，仍让史禄国实际主持史语所留在南方的这部分工作（王传，2015：10）。但从史语所北迁到史禄国1930年北上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任，社会科学研究所堪称中研院边疆调查最有活力的部分。

在社会科学所发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的前八号（1929-1933）中，边疆民族调查占到了半数，除了上文提到了颜复礼、商承祖的广西瑶族调查（第二号，1929）之外，还有中研院特聘的民族学家林惠祥的第一部民族志作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第三号，1930）和任职同济大学的德国医学家史国博（H. Stiibe）与同济学生李化民用德文发表的对浙江景宁畲民的调查报告，《浙江景宁敕木山余田民调查记》（第六号，1932）。而《社会科学研究所集刊》的前三号作品中有两部是边疆民族调查的成果：除了陈翰笙主持写作的《难民的东北逃亡》（第二号，1930）

¹ 在俄国中亚与东亚研究所的资助下，史禄国夫妇在1919年11月24日抵达北京，参见《史禄国1917-1918活动总结报告》，袁剑等译，感谢袁剑兄慷慨分享译文。1923年史禄国发表论文《中国北方之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Extra Vol. II.）其中的体质人类学区分令中国早期民族学学者印象深刻（黄文山[1936], 2013: 238）。史禄国关于满洲社会组织的著作1924年在上海出版（*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Extra Vol. III.），对中国学者的影响更为直接，参见吴文藻在《社会学刊》，第五卷第一期的评论。1925年，史禄国利用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进行的体质测量，出版了《华东和广东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 and Kwangtung Province*）参见王建民（1997：88）。

² 9月1日，杨成志从昆明向滇东北进发，经大板桥、杨林、羊街、功山、钢厂、痢头坡、鹧鸡、东川等地，历时半月，抵达金沙江畔的巧家县城。之后，他在熟悉彝情人士的帮助下，沿着金沙江步行3天至大田坝，乘木舟过险江，到达凉山脚下的一处名为六城坝的县佐驻地。杨成志在自述中说（[1930a]2003:8），“我的目的想把川滇交界沿金沙江西岸长凡二千余里，宽约三四百里，汉人呼为‘蛮巢’，外国人称为独立罗罗的巴布凉山做一个详细探讨的。”



之外，还有中研院委托林惠祥将卢作孚得自西康，于1929年赠予中研院的彝族器具进行说明所得的文字《猓猓标本图说》（第三号，1931）。

1920年代末加入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两位年轻学者陈翰笙与凌纯声以各自的学术路径，进入了东北，并在那里开辟了边疆调查的新局面。1929年的春天，提前结束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陈翰笙转到了同在上海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年夏天，陈翰笙组成的调查队伍前往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进行调查。从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专刊和集刊上的调查报告来看，调查的主要动机是东北的农业经济和从河南、山东等地流落到东北的难民问题¹。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并不是调查者在当地的深入访谈，而是较为系统的基于文献的经济趋势分析。陈翰笙带领的研究者除了接触辽东省铁路经济局的调查资料和档案资料，也广泛利用了国外，特别是日文的社会经济调查资料以及当时中国报刊所见的难民报道。在危机日盛的东北，陈翰笙的调查报告可以说是出色的文献研究（library research）。系统融合档案与传播文献的调查报告在陈翰笙这段时间主持的两项东北调查中非常一致。而同一时期由他在无锡和河北主持的农村调查则有明显的区别。

1930年4月，入职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到一年的凌纯声携商承祖一道赶往东北，进行满族-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调查，调查路线为松花江下游及同江至抚远段黑龙江沿岸地带，即赫哲族的主要分布区域。这三个多月的调查产生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史语所单刊甲种之十四）。和凌纯声一样深受莫斯（Marcel Mauss）与葛兰言（Marcel Granet）影响的徐益堂曾认为这个民族志重族群资料而轻地理，并且对方志材料采纳不够（转引自黄文山，[1936] 2013:240）。但这一民族志事实上成为中研院边疆调查的新起点。

赫哲族调查结束后，凌纯声成为中研院边疆调查最活跃的学者。1933年的初夏，他和三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芮逸夫以及负责技术的勇士衡从南京出发，溯江西行，从武汉和长沙转道沅江前往湘西进行苗族调查。在湖南的凤凰、乾城和永绥三县交界的地区，凌纯声等人完成了三个月的“内边疆”调查²。

就在凌纯声等赶往湖南后的一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杨杏佛被暗杀的事件加速了该所的改制。当凌纯声和芮逸夫从湖南返回南京的时候，社会科学所内的学科组已经开始裁撤。某种程度上，这是该所从1929年开始陷入缺乏核心领导局面的结束。机构变更和随后的学人流动，使得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史语所共同从事边疆民族调查的局面结束，而这两个所也都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研究重心。

在丁文江和北平调查所陶孟和的协商之下，继续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支持的北平调查所在1934年的7月变为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原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的集刊和专刊在合并前后停刊。而北平社会调查所此前主持的两份刊物，《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创刊，每年一卷分四期出版）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创刊，每年一卷，分两期出版，193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成为合并后主要的刊物。此外，社会调查所原本主持的专著系列“社会研究丛刊”则在合并后被新启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取代，第一本著作作为吴承禧的著作《中国的银行》（1934）³。

如果我们对比完全由北平调查所主持的“社会研究丛刊”（截止到1934年）和合并之后开启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两个系列的出版物，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感受到改组带来的学术转向。“社会研究丛刊”主要刊载的是以著名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为代表的一系列生活调查，

¹ 除了《难民的东北流亡》外，还有陈翰笙，王寅生著《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中日俄记载中中国黑龙江流域农民地主农业经济概况》，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专刊”的第一号（1929）。

² 在他们返回南京之后，两人在调查中结识的石启贵继续在湘西的田野工作，参见石启贵（1986）。

³ 参见《社会调查所第八年报告》，载《民国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卷29：453-454。此时，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北京和南京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调查已经备受中国学界瞩目。改组之后，新的社会科学所分成了北平和南京两部分，1935年初全部迁往南京。



既包括研究发现,也包括生活指数的编算办法。陶孟和与他早期的助手樊弘、杨西孟是以进步主义时代盛行的“账簿法”进行的细致调查为代表作品。而“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中,这类以家庭支出为基础的微观调查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类基础研究:国民经济的统计(特别是和国内外贸易与工业化有关的统计和估算)以及中国经济史研究。

《社会科学杂志》的生命则跨越了这次机构的调整。它早在北平社会调查所从纽约宗教调查部独立之后就刊登文章,到1937年因为抗战停办,共出版了8卷31期。这本期刊涵盖的学术范围要比上述两个专著系列都广,但大体上分为三类:国民经济指标的统计报告(包括估计)¹,经济理论和统计办法的简介²,以及中外经济史的研究³。如果算上外贸统计,经济统计类的作品占据了第一大类。很明显,在这个期刊当中,接近生活指数调查或任何微观社会调查的作品仍然是极少数⁴。换言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在独立后其实高度转向了国民经济统计和贸易研究,而非陶孟和此前领导的以劳工生活调查为重点的社会调查。对国民经济的统计,特别是对国际贸易的统计,是和陶孟和年纪相仿、经历相似的早期中国政治经济学和公法研究者在20世纪头20年非常关心的主题⁵。对贸易和工业化的关心,对统计海关数据,对货币情况的分析等尝试在时间上也和中国经济学在20世纪的第一次高峰重合⁶。

社会科学研究所1934年之后真正的新转向是受整理清代大内档案激发的经济史研究。这一变化,除了陶孟和的见识之外,也和调查所从1930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大有关系。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湖南学生汤象龙成为首批研究生中的一员。两年后调查所则招收到了整理和研究各省厘金档案的罗玉东、1933年离开北大经济系的青年学生千家驹,以及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梁方仲和巫宝三成为又一批的研究生。新的史料和社会调查数据使得中研院的社会研究产生了实质上的新学风。这些利用经济史材料整理中国史的年轻人推动新的社会科学走上了社会经济调查与新的经济史并行的道路⁷。“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这个系列的出版物中真正和工业、贸易与货币等国民经济学统计并进的,正是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作品⁸。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激发的史料与史学变革,到1940年代已经扩展至了更为广阔的明清以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⁹。

陈翰笙在“杨杏佛事件”之后离开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正式去职之前,他在1933年5月加入了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和马寅初、陶孟和等一道成为该农村政策研究机构首批聘任的学

¹ 如陈翰笙第一卷1期,《山西的农田价格》;吴铎,第一卷2期,《最近二年来我国政府劳动设施之概略》;第二卷2期,王世达,《最近十年中国的人口估计》等。

² 如第二卷第1期,刘心铨《工资指数编制方法:一个讨论》;第二卷第3期,裘开明《按表亲查法在农场经营研究上之应用》;第三卷第1期,杨西孟《统计学中分割数的问题(附图表)》。

³ 如第一卷第3期,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第二卷第4期,汤象龙《道光朝捐监之统计》;第四卷地4期,王镇中《大战前日本棉纺织业在华贸易之发展》等。

⁴ 比较接近社区民族志的可能算是《北平协和医院的卫生试验区》。仅有第一卷2期,陶孟和写的《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类似《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中收录的,以家庭账簿为基本调查媒介的经济调查其实非常少见的。

⁵ 我们可以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出版系列“历史,经济学与公法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Economics and Public Law)上面刊载的1891-1923年间的博士论文可以略窥一二。按照当时哥大博士论文需要出版的要求,这个系列刊载了大批研究中国的题目。

⁶ 参见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67。

⁷ 就在改组的当年,在社会调查所接触了清代经济史料的年轻学者汤象龙,梁方仲,罗玉东等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在史学界强化了这一经济史的新趋向。而陶孟和和汤象龙则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这一和《食货》齐名的经济史杂志。抗战之后,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也成为陶希圣在北大领导的“食货”学派并驾齐驱的经济史研究群体,参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51年撰写的报告 A Survey of Recent Studies on Chinese Economy: 1927-1947, 第14-15页,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subseries 601s, Box 51, Folder 41。

⁸ 包括罗玉东著《中国厘金史》;余捷琼编《1700-1937年中国银货输入的一个估计》。

⁹ 社会科学研究所抗战后颠沛流离,在1940年到达四川宜宾县李庄时安定下来,而就在李庄较为稳定的6年当中,严中平的棉业史研究,梁方仲对明代一条鞭法的研究,罗尔纲的晚清兵制研究和更为年轻的李文治的晚明民变,和彭雨新的田赋研究都陆续展开,构成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成果。



者。在农村复兴委员会主持的第二批分省调查中，如何在“九一八”之后认识和开发西南边疆的意识更加明确。而奔赴广西和云南的调查者使用的正是陈翰笙设计的调查方案。从各省调查报告来看，此前在东北调查时候形成的融合文献研究的特点则逐渐消失，这和社会科学研究所更紧密地从经济史考辨入手理解社会经济问题的倾向形成直接的对比。

当时几乎所有关注工业化问题与农业经济前途的学者都采取了社会经济调查的形式来进行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所 1934 年之后与何廉、方显廷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路径非常一致，都强调从经济史和工业调查的结合入手进行国民经济的研究，一方面清理现行的公共数据，另一方面以地区和行业为基本单位进行个案研究¹。而陈翰笙此后的经济调查不仅淡化了此前有过的经济史痕迹，也不再明确的社区单位的原则和社区比较的内容。某种程度上，这是早期陶孟和式的社会调查在农家经济领域的继续。

二、

1934 年的调整使得社会科学所和史语所的研究取向有了非常明确的区分。凌纯声、芮逸夫和陶云逵成为史语所中的人类学组成员。这个团体也构成了中研院边疆民族研究的中心²。就在这一年，在巴黎获得博士学位的杨成志返回了学者生涯起步的中山大学，但没有回到启发他田野工作的川康之边。不过，在他返回的时候，这个被西南的巨流和峻岭南北向开出的通道，已经开始成为 20 世纪中国学者边疆民族调查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战时中国的学术历史上，这个区域大致被分为了川-滇与川-康两个亚区³。史语所的民族学者从 1930 年代到抗战转移后所带动的调查，使得川-滇地区民族志作为学术类型开始成型。

在凌纯声和芮逸夫辗转于浙江的山地时，淞沪会战迫使他们供职的史语所从上海迁到了南京。在鸡鸣寺路落户的史语所迎来了战时边疆民族研究最杰出的学者之一陶云逵。对中研院的边疆民族调查来说，陶云逵和一年后入职史语所的吴定良令人类学组名副其实，更让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架构起了从语言、体质和社会结构考察边疆与民族的研究能力。1934 年的秋天，刚刚加盟史语所的陶云逵与大他两岁的常州同乡凌纯声一起承担起了史语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的云南省内调查。五年前杨成志立下的调查云南全省民族的宏愿在陶云逵和凌纯声的滇南、滇北两路调查中展开。凌纯声仍和勇士衡搭档，在南至河口、麻栗坡、蒙自、金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主要考察边民之生活习俗与社会，调查对象包括摆夷（傣族）、麽些（纳西族）、傣傣（彝族）、傣黑（拉祜族）、傣傣、卡多（哈尼族）、扑拉（彝族支系）、茶山（景颇族）、崩龙（德昂族）、阿佤（佤族）等。陶云逵与赵至诚（史语所技术员，负责摄影、绘图）一路，调查区域上，东南至麻栗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重点考察民族体质、语言，调查对象有民家（白族）、麽些（纳西族）、傣傣、窝泥（哈尼族）、摆夷（傣族）、曲子（独龙族）、怒子（怒族）、傣黑（拉祜族）、阿佤（佤族）等民族（李东晔，2011：5）。

1934 年，驻缅甸的英军在云南开矿被云南土司、班洪王联系其他部落所抵抗。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对西南边疆最有雄心的调查恰与中缅边界南部未定界发生的“班洪危机”同时⁴。冲

¹ 根据方显廷的回忆（方显廷，2006:71；83），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工作，是以行业为单位，在天津为中心的华北进行个案研究。

² 1934 年 5 月，在社会科学研究彻底重组之前，湘西苗族调查的三人再度出发，去往 1929 年两位同济大学学者曾调查的浙江畲民地区，根据这次调查写成了《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

³ 关于这一时期的川-滇区域，参见杨成志（[1930b]2003：49）。关于此时的川-康区域，可见马长寿（[1946]2003：216）。陶云逵对云南之民族地理的分布（[1936]2011:124-141）和凌纯声（1936）颇多接近。

⁴ 班洪危机的简介，参见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周光倬的报告书（[1935]2014）和张诚孙（1937）。



突的发生强化了国民政府对中缅边界南段的考察和勘定的决心。外交部求助于中研院加强中缅边界的民族识别工作。凌纯声和芮逸夫在军队的护送下与中英双方代表抵达滇缅边境。从 1935 年底到 1936 年 4 月，凌纯声和芮逸夫带领勘察人员先到镇康，然后到达孟定、耿马，之后再回到孟定，再南向到达勐董城。史语所的民族学家一路协助记录与识别中缅边界地区分布的各个民族（王明珂，2008）。史语所学者和勘界官员以及地理调查学者至此汇聚到晚清光绪年间搁置的中缅边界南段。班洪危机没有太大的影响陶云逵按计划开展的南线调查计划。他的田野调查在 1936 年春天结束¹。

相比起对赫哲族的调查，云南调查似乎对中国的边疆和民族学界的回应没有那么响亮。但它却使得史语所成功延续了自建所以来的边疆民族调查传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民族学组的工作和史语所同时期开展的语言与体质研究呼应起来²。1937 年秋，史语所离开鸡鸣寺路，和众多中国大学一样开始了西迁。在离开南京之前，川-滇调查在抗战前的最后一次重要的田野工作，由毕业不久的马长寿来主持³。

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聘马长寿为助理研究员，他在 1936 年开始了西南民族调查。这项由中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织的项目与史语所的云南调查前后相连。马长寿、赵至诚、李开泽（文书、会计）三人组成的考察团于当年 12 月 19 日从南京出发，次年初抵达了成都⁴。和史语所的云南调查一样，马长寿主持的川康调查也分成了南北两路：北路由灌县至汶川、理番、茂县、松潘考察羌民、嘉戎、西番，南路由宜宾入凉山转至西昌、盐边、盐源、会理，考察罗彝、麽些、傈僳、彝夷、苗人等⁵。川康考察团首先考察的是凉山罗彝。1 月 14 日，在四川建设厅 2 名人员陪同下，马长寿等三人从成都出发，抵达宜宾，沿金沙江西上，于 1 月 23 日抵达屏山县城，开始调查罗彝，调查至 6 月 17 日他们离开汉源县止，共在彝族地区停留 145 天。

南京陷落与学术机构内迁，暂时打断了马长寿计划中的北线调查⁶。马长寿将重心再放回到了凉山。1938 年 12 月，他前往越嵩县田坝进行田野工作。和上一次的凉山考察不同，马长寿在越嵩的调查采取了深度的田野观察的形式。在越嵩河西畔之斯补、尼帝两个土司区域，集中做社区研究。从 10 日到达斯补勒陀开始，到 1940 年 4 月 5 日离开，共计 115 天（马长寿，2006：1-3；71-75）⁷。马长寿在乐山写成了他凉山考察的卓越民族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

1941 年，在史语所再次因为战火离开云南并落户四川宜宾李庄之后，川-滇的调查才真正恢复。1942 年底，芮逸夫和就读于史语所的硕士生胡庆钧离开李庄，前往川南的威信县和叙永县进行苗族调查。在叙永县南部的鸦雀苗区，芮、胡二人作了历时一个月的初步考察，观察了十几

¹ 陶云逵抗战后离开史语所，辗转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母校南开大学，在南开他主持边疆人文研究室，直至 1944 年去世。云南调查奠定了英年早逝的陶云逵最重要的学术基础。其著作收入陶云逵（2011）和陶云逵（2017）两部文集。

² 原本在北线调查的勇士衡在 1936 年后又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云南各地补充调查。勇士衡的调查路线为昆明、蒙化、蒙化、临沧岩帅、双江猛库、墨江、西双版纳、车里，见史语所对调查路线的图像化，参见网站 <http://gissrv5.sinica.edu.tw/mi/>。

³ 在此期间，史语所的西南调查除了石启贵 1938 年在湖南苗区的继续调查之外（参见石启贵，1986），还有芮逸夫 1939 年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等地进行贵州苗族与布依族调查，参见王明珂（2008）；杜臻（2015）；黄克武（2016）。不过，从奠定川-滇调查的基础作用来讲，马长寿的凉山罗彝调查成为关键。

⁴ 参见王欣（2013）。

⁵ 参见马长寿（2006，第 1-3 页）；王欣（2013）。

⁶ 在南线的调查计划结束之后的四十多天里，马长寿在成都整理调查资料。8 月 3 日，考察团按照原计划进行北路调查，不过，因为南京的陷落，马长寿的调查主要是在岷江上游进行，于 12 月 21 日回到成都，参见马长寿（2006：73）。

⁷ 在这段时间川康边区考察在 1930 和 1940 年代的政学两届得到了很多的关注。1938 年，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总干事长杭立武拨款组织“川康西南西北之科学考察团”，聘请学者和大学生准备前往川康调查。1939 年，中英庚款资助下的“川康西南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四川乐山成立，邵逸周任团长，参见汪洪亮（2014:285）。



处苗人生活（刘芳，2010；芮逸夫，2010）。1943年初，两人分开，芮去海坝乡南凹田，胡去峰岩。胡在结束调查后，回李庄进行硕士论文写作，芮则到大树乡，搜集婚丧礼俗资料，工作40天后，去东部落窝乡、西部大坝乡、古宋县境内的白苗进行调查。5月中旬，芮逸夫结束川南叙永苗族考察，在泸州蓝田坝返回李庄。随着陶云逵和凌纯声先后离开史语所，芮逸夫的调查可以说是史语所创建川-滇民族志类型的节点。中研院自1934年改组社会科学所，促使民族学的研究力量转移到史语所之后的十年，在芮逸夫的调查中画上句号¹。

先后进入到这片地区的杨成志、陶云逵和马长寿都尝试用“西南民族”来讨论自己的田野工作。熟悉西方传教士调查与包含汉学在内的东方学研究是上述西南边疆调查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将中国正史和方志中的西南族群记述与汉学和传教士文献对照，是边疆研究考察族群区分的基本手段（马长寿，[1936b] 2003:50）。杨成志1933年在法国“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上的报告，以《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为名发表于《禹贡》（杨成志，[1934] 2003）。在文中，他并没有展开对西南民族的界定，而这篇长文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而是异常博学地讨论了古史，尤其是东方学文献中的罗罗史传。

陶云逵宏阔的比较文明视野和清晰的社会分析能力，首先体现在他如何极简地定义云南的边疆民族特性上。他首先将云南视为藏传佛教和小乘佛教传播造成的文明接触带（cultural marginal area，[1941] 2011: 96）。这一点和马长寿对西南民族的界定如出一辙（马长寿，[1936b] 2003: 49-50）。其次，陶云逵将一般意义上的中原-边陲关系（即通常所谓的汉化）拆解为建政（“中原化”）、同化（汉族与非汉族的相互涵化）以及分属不同语族的非汉族群之间的转化等不同的族群关系（[1941] 2011: 97-98）。最后，陶云逵非常简洁地指出，云南最宏观的文明化进程（即宗教文明的分殊）和包含不同机制的汉化进程的交错，使得云南内部的亚区没有沿着宗教边界分开，而是在汉化明显的滇北和不充分宗教化的滇西、滇西南和滇南之间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这个空白地带，实际代表着云南的“土人”，或者说“前中印文化层”（PreSino-Indic Culture Stratum，同上书: 100）的特点。研究云南在族群意义上的特殊性即在探索此中间地带的构成与演变。

历经坎坷，在2006年方始出版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代表了马长寿最成熟的田野工作，在这个民族志完成的部分中，我们清晰看见对田野观察材料（实物、访谈和仪式观察）、文献材料和口传材料（神话类型）三种类型的研究对象充分的探究。这种分析在他此前充满莫斯气息的关于“花甲生藏”之缘起和类型比较的文章中已可见到基本的构架（马长寿，[1936a] 2003）。该文的田野工作部分主要是他在山西昔阳县对口传资料的整理和当地出土墓葬（第八、第九节）的考察。但其对民俗和神话类型的娴熟比较，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莫斯在其名著《礼物》的第一章的描写。

从史传中讨论族群分类，马长寿心中最完美的标准是将经济、政治和习俗结合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后者将“西南夷”分为“耕田民族”“随畜民族”和“半耕半猎”民族。而正史中对西南族群分类的关键转折在范晔的《后汉书》以“蛮羌夷狄”四个基本类别来统摄更为纷繁，与具体的地域和文化关联更紧密的族类（马长寿，[1936b] 2003: 51-53）。“四夷说”的形态，奠定了后世史学书写族群的典范，但在马长寿看来则是对《史记》简单而深刻的写作形式充满遗憾的背离²。马长寿的意思是，正史叙事的优点，不在于能科学地界定族群，而是提供了合理的

¹ 1962年，在管东贵的协助下，芮逸夫此次调查的民族志《川南雅雀描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作为史语所单刊甲种之二十三正式出版

² 因此，他眼中魏源只是根据有无地方君长而将“西南夷”分为“苗”（无君长）和“蛮”（有君长）的做法是更成问题的。比较杨成志（[1930]2003: 140）对此“四夷说”基于华夷史观的批评，可知马长寿对古史体例内在的变化还是有所察觉的。胡鸿（2017:116-162）对四夷说的形成通过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



“亚类”。

早在 1936 年，徐益棠就将马长寿的分类与西南民族调查的先行者丁文江的四分法进行了比较，认为都是在大规模体质测量不可能的情况下而不得不从语言学分类着手的办法（徐益棠，[1936] 2002:152-153）。但马长寿从一开始很明确了史志记载与语言学分类结合的必要性¹。他对西南民族分类的讨论，主要是非常细致地论证西南民族三分法的框架对于可知的各个族群的适用性²。他对方志中的语言和体质记载的娴熟掌握，和杨成志对东方学文献的梳理可谓相映成趣。如果我们将马长寿对西南民族源流考证的文章放在一起，我们发现，马长寿结合了可靠的体质材料之外的几乎所有类型分析，从神话谱系到民俗传播的辨析，但和同时期写作《中国民族史》的林惠祥相比，马长寿的重点并不在于古史民族和现代民族的复杂对应，而是将古史民族中的族名作为“亚类”，进行进一步的类型划分。

而马长寿从《史记》中读到的合理的亚类，也正是他曾经的西南调查同事凌纯声和芮逸夫在 1940 年代后的关注焦点。芮逸夫（[1942] 1972: 3）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将中华民族作为具有“达名”的类，而各个具体的民族则是作为“私名”的类或者“次亚类”，而两者之间的以生态（如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和广义上的文化（如佛教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界定的类别，则是作为“类名”的“亚类”。那么马长寿在《史记》当中读到的“西南夷”三分法，正是芮逸夫在此文中用力最多的“亚类”。凌纯声分述“中国边疆政治制度”的若干文字，也是尝试用历史上的“边政”来充实他所谓“边疆民族”和“边疆文化”这一亚类的内涵³。

除了对历史上的治理制度没有详细考辨（马长寿 vs 凌纯声）之外，马长寿与凌纯声及陶云逵的一个明显差别是对族群在地理分布上的差异没有那么敏感。而凌与陶重视这一分布的原因是希望解释地理分布，特别是垂直分布的差异，究竟只是不同族群的生态适应性上的差别，还是有“民族强弱不同而生的社会选择现象”（凌纯声，芮逸夫，[1947]2003: 第 2 章；陶云逵，[1936] 2011: 136-141）。也就是说，这种对生态适应区（ecological niche）的具体解释，不仅关系到族群社区之间的分界，也涉及这种分界在时间中随人群迁徙和竞争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前者和艾克瓦（Robert Ekvall, 1939）在甘肃藏边进行的人文生态学民族志非常接近。而将共时和历时性的关系结合起来，则是人文生态学更直接的体现，这在看上去最不像边疆研究的燕京社会学当中颇有体现。

三、

历史有些错位的是，选择回到燕京社会学继续工作的林耀华没有进入到吴文藻在昆明创办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工作站⁴。与燕大社会学素无渊源的陶云逵来到了“魁阁”。1940 年，离开学界入职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的吴文藻身在重庆，而他最出色的学生们则分属昆明和成都三所不同的大学。但在吴文藻看来，这些都不构成燕京社会学传统的转折⁵。在他眼中，燕京社会学 1938

书写比较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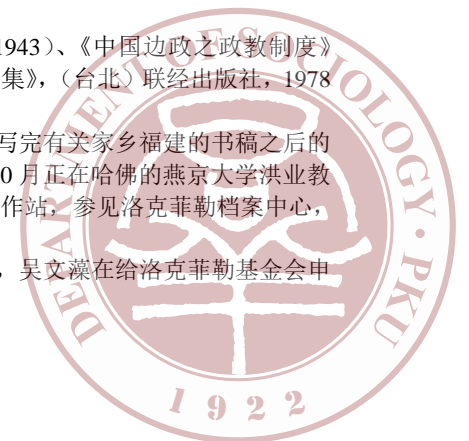
¹ “史志记载之价值直接可辩证语言分类之真伪，其功能远在诸文化物质之上”（马长寿，[1936b]2003: 51-53）。

² 马长寿的分类法，基本上为林耀华（[1942]2003: 223）所采用。

³ 这些文字包括《中国边政之盟旗制度》（1943）、《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1943）、《中国边政之政教制度》（1954），以上均收入氏著，《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凌纯声先生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78 年。

⁴ 根据林耀华自己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冈恩（Selskar Gunn）的信中，他在哈佛写完有关家乡福建的书稿之后的取向又二，一是回到北平，加入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这是受到了 1940 年 10 月正在哈佛的燕京大学洪业教授（William Hung）的支持，二是去云南，加入云南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的工作站，参见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3。

⁵ 工作站 1942 年报告（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Box 23, Folder 214）页 6，吴文藻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申



年之后在西南和西北边疆继续发展的核心是基于田野工作的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 sociology)。这个路子因为能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工作,不仅适合战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将社会学的“专刊”(monographic)方法与功能主义结合起来,使得个案的类型化具备了最高的学术价值¹。吴文藻亲自指导的工作站在1938-1941年的代表性成果当属费孝通和当时在燕京大学攻读硕士的李有义在禄丰县的禄村调查(1938年开始)²。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张之毅于1939年在易门县的“易村”进行手工业调查,1940年在玉溪县的“玉村”进行的农业和商业调查,李有义1939年夏天在路南县的“尾村”进行市场和交易调查。更年轻的史国衡和田汝康1941年也开始了新的研究。在吴文藻看来则是更为成熟的“专刊”社会学在非汉语人群(non-Sinitic)社区中进行的尝试³。

日军对越南的占领和中国远征军的开拔使得云南工作站的民族志社会学非常紧迫地面对了真正意义上的边疆问题。工作站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家都被期待着像几年前的史语所同行那样,用自己的调查来清晰地呈现边境的族群和劳工状况,以此协助恢复云南到缅甸的交通,以便远征军顺利通过中缅边界⁴。1943年,入职成都燕京大学的林耀华在大小凉山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边疆田野工作⁵。他和杨成志在同样的地方开始了边疆调查,他先去凉山,再入川康北部调查嘉戎藏族的计划和几年前马长寿的调查路线几乎一致。1943年的夏天,林耀华带着学生胡良珍离开成都,经过宜宾县、屏山县,最终到达属于小凉山的雷波县,在那里开始了50天的田野工作(整个旅程88天)⁶。1945年,林耀华在当时任教成都的燕大同事李方桂的帮助下写成了英文文章《傈僳族的亲属体系》⁷。

非汉语社区的研究对于吴文藻来说的确不是到了边疆之后的想法。吴文藻在北平燕大时候就设想是将非汉民族和汉族进行社区类型的比较(吴文藻[1936]1999:482)。这在燕大社会学南迁之前的代表作中就能看到:在费孝通和王同惠对花篮瑶的社会组织调查中,人口(人口流动和生育率变动为其动力)造成社会密度的变化是边疆地区冲突的根本原因。在杨庆堃以市集为对象的人文区位分析中,基层人口的流动方向和聚集模式则和分为“基本集”和“辅助集”的基层市集紧密相关⁸。

人类学史研究曾用“内在他者”(internal otherness)和“初民逻辑”(savage logic)这对著名的概念来区分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的德国人类学和英帝国人类学(Stocking, 1982; Proctor,

请资助的项目预算里面,将转移到西南的燕京社会学分成了云南和成都两块,云南工作站的部分为费孝通主持,在成都的燕京社会学则由李安宅主持,1943-1943年的财政预算中,云南部分的费用是19800美元,成都部分是12000美元。

¹ 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1944:3)将monographic sociology直译为“专刊社会学”,此说法的内容在吴看来,是对个案由功能联系起来的整体性作出描述。本文中仍使用吴文藻的译名。

² 费孝通和李有义在禄村的调查在1938年的11月到12月之间进行,1939年8月到10月,费孝通和张之毅和张宗颖进行了第二次在禄村的调查。1940年底,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在《社会学丛刊》发表。

³ 工作站1942年报告(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4)页2。

⁴ 工作站1942年报告(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4)页1。

⁵ 林耀华的博士论文《贵州苗蛮》虽然关于边疆但却完全是文献研究。因此,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项目推荐林耀华的Conrad M. Arensberg认为林耀华的博士学位是远东史(Far East history)而不是人类学,他和另一位推荐人,人类学家Carleton S. Coon都阅读了林耀华正在写作的《金翼》书稿,认为这个关于福建农村社区的研究异常精彩,并且对理解一般的农业社会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参见Arensberg和Coon1940年11月给林耀华的推荐信,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3。从1940年6月毕业到1941年底离开美国,林耀华在此期间的全部工作都是利用他在1936-1937年的福建调查时候获得的材料来写作《金翼》。

⁶ 林耀华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参见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21。

⁷ Kinship System of the LoLo, 参见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9。

⁸ 费孝通因此将杨庆堃这一研究和在云南的市集的研究视为连续,参见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box folder 215。关于早期社区研究人文区位论述,详见侯俊丹(2018)。



1988: 139)。套用这个概念，吴文藻设想的非汉语人群的社区研究，是一个社会化了的“内在他者”方案，因为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非但见不到德国人类学和东方学在处理“内在他者”时候的焦虑和自我投射（Marchand, 2009），甚至也鲜见蔡元培和凌纯声在区分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时候区分文明和自然的意图。马长寿关心的文明与文化的区分，似乎也不那么明确。

费孝通说得很坦率，他的社区研究设想之中的自然是自然史意义上的¹。研究初民社会的人类学提供了整体事实的方法，但怎么样能将之作为一种社会学来研究当下的中国社会，来对抗社会学按照某一类社会事实建立分支社会学的趋势，是工作站要解决的问题²。在村庄经济变迁研究中，费孝通试图将带有浓重芝加哥学派的“自然史”变迁（natural history change），也就是每一个农业村在土地和人口上的变迁，与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结合起来。所谓的结构变迁，指的是农村社区结构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新的经济要素。因此，三村的一个比较维度在费孝通看来，是纯然农村社区结构与被手工业改变的农村以及被集体企业改变的结构，三者之间的比较³。费孝通执笔的《战时社会学研究报告》试图从两个方面细化前文提及的“民族志社会学”的基本内涵。一方面，工作站的村庄调查都是在“事实”（fact）而不是“事件”（event）的意义上进行的研究，也就是说不是在占有具体历史时空的对象，而是在构成这些具体村庄的一般社会机制上进行的田野工作⁴。因此，费孝通认为吴文藻所谓的田野工作同时，也是社区类型化的工作，但如此形成的类型只有在比较中存在。燕大-云大工作站在社区研究的方法上仍自认为继续和完善了此前的人文生态的研究。从他们以田野工作成全类型化的思路来看，工作站的学者并不认为边疆改变了社会学的整体思路。这样的研究与陈翰笙聚焦在生产关系要素的农村调查仍有重要的差别⁵。

工作站于1942年3月连开了三天年会，对此前和此后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和计划。不难看出，工作站代表的边疆社会学的确沿着吴文藻心中“民族志社会学”（ethnographic sociology）的方向前进，在社区研究中继续贯彻了类型化的方法论。在工作站第一波的调查中，村庄成为工作站调查的基本单位，而村庄的经济形态和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则是所有调查研究共同关注的焦点。村庄调查所发现的经济心态、交易行为和组织方式成为工作站的年青学者们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经济模式的起点。1942年的史国衡和田汝康承担着工作站下一阶段最有希望的研究计划：史国衡的劳工研究将要解释在熟练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云南的工厂是如何以师徒制来“再生产”有效的劳动力的。而在田汝康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摆夷的摆”研究中，宗教与“夸富”性的财物（they dispose their property ruthlessly in the feast）消耗的关系，被工作站的学者们认为是找出新的经济心态的入手点⁶。

¹ 费孝通的“自然史”说法，此时完全来自帕克：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7。他在1933年的短文《社会研究的程序》当中对这种自然史的倾向有很直白的阐述，他从流动和变迁中分出两途，一途为“历史”的途径，研究变成什么，这个是芝加哥学派最早的重要作品《波兰农民》之取法；二途为“历程”的途径，也就是帕克关心的从冲突到调节，从调解到同化的过程，参见费孝通（[1933]1999: 94-95）。这个过程不仅在《城市》一书的前言中被清晰提到，也被作为帕克的学生们的研究取向在城市民族志内外进行，例如Edwards（1927）；Thrasher（1927）；参见Abbott（2001:149-150）；Deegan（2001: 12-13）对此自然史含义的阐释。

²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页10，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15。这个观点在他的《乡土中国》后记中说得更加直白（费孝通[1948]1998: 89-91）。

³ 参见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8。

⁴ 参见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6。

⁵ 何谓聚焦在生产关系的要素，陈翰笙自己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1985:6）一文中说得很清楚：“当时做的分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农户抽样4种调查，第一种注重分配，第二种注重生产，第三种注重交换，第四种注重消费，第一二两种各自独立，第三、四两种则系补充性质”。费孝通（[1939]2001: 159-164）在《江村经济》中就陈翰笙将永佃制看作是历史上生产关系的遗存，而不是不在村地主（掌田底权）和本地佃农（掌田面权）之间的金融关系进行了批评，认为华东的永佃制说明的是资本倒流入农村的后果。

⁶ 对宗教的社会考察是以社区经济形态比较为基础的工作站研究的一个初步的转向。如费孝通所言，许烺光在大



因此，对吴文藻和费孝通来说，一方面，无论从社会构成还是从政治构成来说，边疆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这种完整的世界，并不是保留内地已经被现代化消除的本来面貌的“初民社会”，而在于其将内在各部分关联起来的功能结构。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的整体观不构筑在任何文明论的基础上，这个整体不是幽闭的，而要面对活生生的现代经济的变化，着眼于西南的政治眼光、口号和学术运动也构成了这个地域最重要的现在时刻。学者需要打破政治史的中心-边缘观念，重新构造各种比较类型，在新的知识视野中将边疆带回。

这个知识的判断也非常贴切地反映在吴文藻对《社会学丛刊》的设计当中。原本分为四部的该系列丛刊实际指只出版的甲乙两部，甲部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乙部刊载的是民族志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包括“乡镇社区实地调查报告”和“边疆社区实地调查报告”。“云南三村”的研究属于前者，而林耀华和田汝康在凉山与云南的民族志属于后者。

与吴文藻不同，李安宅和费孝通都感到历史对于民族志社会学提出的重要挑战。对吴文藻来说，历史研究根植于文化的时间性，因此历史研究与功能研究相辅相成（吴文藻，[1936] 1999: 488）。费孝通更想探索的是社会学所具有的一种很特别的历史意识。工作站对当代社会的聚焦，在费孝通那里是对“活着的传统”的聚焦，也就是说，是对被记忆留住的过去的聚焦（living past）。在费孝通看来，关注这种被记住而活着的现在，意味着同样关心对未来的期许（wishful）。社会学的“当下”，就是被记住的过去和想过的未来这两种意愿的投射（projection）¹。如何将清晰的“自然史”与遍布中国学术的历史感结合，这是战时的工作站没有想清楚的，但也许是我们通过这段西南边疆的学术小史可以继续探究的问题。

结语

杨成志 1928 年多少有些预期之外的凉山调查，开启了中国学者从蔡元培所期望的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入手调查西南边疆的学术史。本文简述了 1928 到 1947 年的这段学术史中一些重要的时刻和事件，认为 1934 年的改组是原本合力进行边疆民族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史语所各自学术转向的契机。新的社会科学所开启了近代中国经济史的新方向，而接纳了民族学家的史语所则在西南，特别是川-滇调查中开启了史志与东方学文献对照，在“国族”与“族群”之间探索作为亚类的“西南民族”的独特路径。这个方向和南迁后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的重要区别在于，后者坚信立足于人文区位学是可以将边疆的非汉族人纳入社区比较的类型当中的。但这种民族志社会学深深嵌入到一种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自然史”观念中，其相信历程而不是历史的特点在费孝通那里构成了深刻但没有解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从中外学术与思想史上继续探讨。

参考文献：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

蔡元培：《蔡元培民族学论著》，中华书局，1962 年。

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一位中国经济学的七十自述》，商务印书馆，2006 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后记》，《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理的研究记录了也就是当地居民如何以医学和巫术并用的手段应对从缅甸传入云南的霍乱，这是对宗教进行研究的开始。在巫术，特别是巫医中看待地方宗教，后来在燕京大学的廖泰初教授于成都西北的崇义桥的服务站重点的内容。参见 The First Annual Report on the Work Done by the Rural Research and Service Station College of Public Affairs, Yenching University, 第 8-9 页，洛克菲勒档案中心，series 601, box 23, folder 221。

¹ 参见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war-time China: 7。



- 费孝通：《社会调查的程序》，《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
-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
- 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黄文山：《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黄文山集》，赵立彬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936]年。
- 蒋智由：《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1903年第37期。
- 李方桂：《广西凌云瑶语》，《史语所集刊》第一卷第4分本，1930年。
- 林耀华：《边疆研究的途径》，《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
- 凌纯声：《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
- 凌纯声：《云南民族的地理分布》，《地理学报》1936年第三卷第3期。
- 马长寿：《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其社会组织》，《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马长寿：《中国古代之花甲生藏之起源与再现》，《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马长寿：《中国西南民族分类》，《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马戎主编：《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彭文斌：《中西之间的西南视野：西南民族志分类图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10期。
- 芮逸夫：《中华国族解》，《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唐山出版社，1972年。
- 陶云逵：《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11年。
- 陶云逵：《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11年。
-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人民出版社，2014。
- 王传：《史禄国与中国学术界关系考实——以“云南调查事件”为中心》，《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 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云南教育出版社，1977年。
- 王利平：《知识人，国族想象与学科建构：以近代社会学和民族学为例》，《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3期。
- 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 徐益棠：《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 西南边疆卷四》，马玉华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徐益棠：《中国民族学之发展》，《民族学研究季刊》1946年第5期。
- 杨成志：《单骑调查云南民族述略》，《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杨成志：《广州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出版物提要(书报介绍)》，《新亚细亚》1931年第一卷第六期，第145-148页。
- 杨成志：《我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族》，《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
- 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三联书店，2010。
- 张诚孙：《中英滇缅边界问题》，《燕京学报》，1937年。
- 郑娟、梁捷：《中国经济调查与中国经济学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一期。
- 周光倬：《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
- Aarsleff, Hans. 1982. From Locke to Saussure: Essays o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bbott. 1999.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Chicago School at One Hund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bbott. 2001. *Time Matters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delman, Jeremy and Stephen Aron. 2001. *From Borderland to Borders: Empires, Nation States and Peoples in Between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Barth, Fredrik. 1969.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Bloch, Howard. 1990. "New Philology and Old French." *Speculum*, 65 (1):38-58.
- Cole, John and Eric Wolf. 1999. *The Hidden Frontier: Ecology and Ethnicity in an Alpine Val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aig. 1984. *Schola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and Alsatian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egan, Mary Jo. 2001. "The Chicago School of Ethnography."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Edited by Paul Atkins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umont, Louis. 1994. "German Ideology: From France to Germany and Ba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dwards, L. P. 1927.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bvre. 1973. "Frontière: the Word and the Concept", *A New Kind of 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Peter Burke and translated by K. Folca.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 Geary, Patrick. 2002. *Myth of Nations: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ndner, Rolf. 1996. *The Reportage of Urban Culture: Robert Park and the Chicago School*. Translated by Adrian Mor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chand, S.L. 2009.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lender, Maurice. 1992. *The Languages of Paradise: Race, Religion, and Phil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gden, Anthony. 1982. *The Fall of Natural Man: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Eth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roctor, Robert. 1988. "From Anthropologie to Rassenkunde in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Bones, Bodies and Behavior: Essays on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Edited by George Stocking. Pp: 138-179.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Ringer, Friz. 1969.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hlins, Peter. 1989. *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hlins, Peter 1990. "Natural Frontiers Revisited: France's Boundari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5(5)pp. 1423-1451.
- Shirokogoroff, S. M. 1930. "Phonetic Notes on a Lolo Dialect and Consonant L." 《史语所集刊》第一卷第 2 分本: 183-225。
- Thrasher F. M. 1927. *The G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hittaker, C.R. 2000. "Roman Frontiers and European Perception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13 No. 4: 462-482.

